



霜红室随笔

我的书斋生活

这个题目看来很风雅，其实在实际上未必如此。第一，我久已没有一间真正的书斋，这就是说，可以关起门来，不许任何人闯进来，如过去许多爱书家所说的“书斋王国”那样的书斋。在许久以前我很希望能有这样的一间书斋，可是现实早已闯了进来，面对着我，使我不得不同它周旋。从此我的书斋成了家中的休息室，成了会客厅，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有时甚至成了街上小贩的货物推销场，他们会从窗外伸手进来向我招呼：“先生 要不要这个？”

最初，我还想挣扎，想在我的四周筑起一道藩篱，就是无形中的也好，至少可以守护着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后来渐渐的知道这也是徒然的，现实是无孔不入的，只好自己走了出来。

没有了藩篱，也就没有了界限，从此我不再与现实发生冲突，我的书斋天地反而变得更宽阔起来了。

现在，我所说的书斋，就是这样的一个书斋：四壁

都是书，甚至地上也是书，是一间不折不扣的书斋，可是这间书斋却是没有门户和藩篱的，谁都可以走进来，我也可以自由的走出去。

就在这样的一间书斋里，我在这里写作，我在这里读书，我在这里生活。

书斋的生命，是依赖书的本身来维持的。一间不是经常有新书来滋养的书斋，那是藏书楼，是书库，是没有生命的，是不能供给一个人在里面呼吸生活的。我的书斋生命，就经常用新书来维持。这是书斋的生命，也就是我的写作生命了。

作家的书斋，随着他的作品在变化；他的作品，也随着他的书斋在变化。

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几本书，一个没有一间书斋的作家，纵然他的这间书斋，只是一只衣箱，一张破板桌也好，他必需有一个工作场。不然，他从什么地方将他的生活制造成作品，供给他的读者呢？

我更不能想象一个不读书的作家。读书，是作家生活的一部分。他从书本上，为他的写作生命汲取滋养，使他的生活更加充实，也就给他的作品增加了光彩。

就这样，我就经常在买书，也经常在读书，使我的书斋维持着它的生命，也使得我的写作生活获得新的

滋养，希望我有一天能够写得出一篇较充实的富有新生命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书斋生活。我坐在这间撤了藩篱的书斋里，将我的写作、读书和我的生活打成一片。虽然，有一时期，我很想使我的书斋成为禁地，不让别人走进来，我自己也不想走出去。

现在我就这么生活着，生活在我的这间没有门户，撤去了藩篱的书斋里。

琉璃厂的优良传统

去年我到北京，在琉璃厂的古籍书店里买了一部《金陵丛刻》。我想买《金陵遗书》买不到，买《日下旧闻》也买不到。

今年又去了，当然仍是由阿英兄陪我去的，到了内部楼上的那座大书库里，接待我们的仍是去年见过的那位服务员。我一直走到史地部门的书架前，还不曾动手翻书，那位服务员已经笑嘻嘻的对我说：

“仍是只有去年的《金陵丛刻》，没有别的什么新的……”

我不觉一怔，这位服务员的记忆力可真惊人。他不仅还记得我，更记得我去年曾经买过什么书，以及想

买什么书而买不到。

“那么，《日下旧闻》仍是没有？”

“没有 没有《日下旧闻》。也没有《金陵遗书》。这类大部头的掌故书，近年愈来愈不容易得了。”

从前人都说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店员记忆力好，对于汗牛充栋的架上藏书，只要一经过目，就能说出它的版本流源、优点和缺点。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常来的顾客，更记得他们喜欢买那一类的书，以及曾经买过一些什么书。所买的是什么版本，书价如何。能够侃侃而谈，如数家珍。现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优良的传统，在今日的琉璃厂不仅被保存下来，而且更发扬光大了。

以我这样的顾客来说，去年去过一次，逗留的时间也不过一小时，东翻翻、西看看，随便买了几册价钱很便宜的书，当然也同他们随口聊过几句，留下的印象至多是这个外来的顾客还不是门外汉，其他就不该还有什么值得他记忆之处。但这位服务员今年一见了我，不仅记得我在去年同一时期曾经来过，而且还记得我买过什么书，以及想买什么书而买不到，这就不简单了。

北京商店的店员，一向以对人和悦，服务殷勤周到闻名全国。今日新北京各行各业的服务员，对这光荣

的传统作风，更懂得郑重的加以保存。忠于所职，勤于所事，为顾客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点道理，他们一定早已搞通了。因此在琉璃厂的书店里，这才可以遇到将自己的职务发挥得这么出色的好店员。

在同一条街上的荣宝斋画店，那里的风格又全然不同。因为书画是要仔细欣赏的，一切布置得十分舒服宽敞，你到了里面，随意四处走动，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也不来陪伴你。除非你向他们询问什么，否则总是没有人跟在你的身边，扰你的清兴的。

气氛不同的书店

香港最近开设了一家专售外文书刊的书店：和平书店，日前我特地去参观了一下。由于是新开张，陈列的书刊种类还不算多，而且要买的大都早已买了。但是沿着书柜四周看了一下，从古典文学、美术语文以至社会科学，毕竟气氛有点不同，因为在香港一般外文书店里见惯了的东西这里见不到，这里所见到的有许多却是别家书店所没有的东西。

这样别具风格的外文书店，在世界各大都市大都总有一两家，如巴黎的环球书店，伦敦的柯列特书店，英法的读者，如果想看看新中国的书刊，就一定要去光

顾他们。这样的书店 虽然不是“同人”性质 但是总象是同人办的一个小刊物或是出版社一样，你一走进去，就有一种份外亲切的感觉。

北京的国际书店也是一家这样的书店，规模可大得多了。我曾经去买过一次书，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性质的书店。有些语文虽然是我不能读阅的，但无论是瑞典文的也好，波兰文的也好，埃及文的也好，只要是书，而且是内容健康的书，我总要忍不住拿在手里摩挲一下，这就好象见了言语不通的外国友人一样，即使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是热烈的握着手，友情的温暖仍是互相可以沟通的。我当时就曾经将我看不懂的一些外文书刊，一再从架上取下来，揣摩它们的书名和内容，同样的觉得不忍释手。

从前上海也有一家这样的书店，起初开在北四川路桥邮政总局附近，面对苏州河，后来又搬到静安寺路，是一位德国老太太开的，我已经记不起这家书店名称了，它是当时上海唯一专门出售进步外文书籍的书店。当时上海虽然已经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开设的规模很大的西书店，可是他们是不卖这种书籍的，而且里面的店员势利得惊人，除了老主顾以外，面生的中国人走进去，他们就象防贼一样的跟在你的身边，甚或直率的吩咐你不要乱动架上的书。鲁迅先生就遇过这样

的事，以致不得不从怀里拿出一叠钞票放在桌上，表示是带了钱准备来买书，不是来偷书的，这才使得店员刮目相看了。

这家德国老太太开的书店，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正是在那小小的橱窗里，我第一次见到珂勒惠支的版画原作。这一批版画，后来都给鲁迅先生买去了。我有机会看到《资本论》的英译本和《震撼世界的十日》一类的书，都是拜这家书店之赐。至今我的书橱里还存有一本德文版的墨西哥大画家里费拉的画集，就是从这家书店里买来的。适才我取出来翻了一下，书页上还记得“一九三二年除夕前二日购……”，使我又重温了一遍这些可爱的记忆。

为书籍的一生

《为书籍的一生》！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富于吸引性的书名。在新波的书架上见了这本书，忍不住立即取了下来。我感到了脸红，未曾读过的新书实在太多了。不仅未曾读过，就是连这书名也未曾听过。

这本书的装帧非常好。全黑的书面，字和封面画的色彩是白红两色。红色用的极少，只有“为书籍的一

生”的一个“为”字是红的，大约是强调这一生为的是什么，夸张和装饰的效果都极好。

书脊也是全黑色的，作者的名字是红字，书名是白字，用的全是普通的粗体铅字，简单大方，这是德国派的装帧手法，很容易引人注目，因此在书架上一眼就被我见到了。

取下来一看，原来是一本翻译。原作者译名“绥青”是旧俄的出版家。不用说，《为书籍的一生》，一定是他的自传了。旧俄的社会，很有点象是我国解放前的黑暗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从事出版工作，依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定是有许多恢奇的遭遇，象童话一样的令人不会忘记的，这本书的内容一定很丰富而且有趣，我为什么竟不曾读过呢？不禁拿在手里翻来复去的看，舍不得放回架上。

新波看出了我的心意，爽快的问：你喜欢这本书吗？就送给你吧。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这正是我的私衷，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他既然看穿了我的心思，我自然也不再客气了。于是这本《为书籍的一生》就放进我的行囊，跟着我一起回到我的家里，这个几乎一生也是为了书籍的家。

《为书籍的一生》是国内三联书店出版的 译者是

叶冬心，出版年月是一九六三年的七月，初版印了二千册。这样的书销路是不会怎样大的，因此二千册的印数恰到好处。大约也正因为印得并不多，我在这里的书店里竟不曾见过。若不是在新波的书架上无意中发
发现，几乎要失之交臂了。

原作者已在一九三四年去世。他的出版工作，是跨着俄罗斯新旧两个时代，新旧两个社会的。仅是这样的经历，已经有许多事情值得他回忆了。我国也有不少出版工作者，是有这样经历的，他们之中如果有人肯写 同样也可以写得出一部《为书籍的一生》。

《新俄短篇小说集》

在最近一次的长途旅行中，无意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得一本小书：《新俄短篇小说集》，一九二八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这是我自己翻译的几篇苏联短篇小说的结集，出版日期距今已经三十年，难怪若不是无意见到它，连我自己也忘记曾经出版过这样的一本书了。

回来查阅张静庐先生编辑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在记录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为止的《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内，果然见到有这本小书的著录，而且在年份上说 除了曹靖华先生的《烟袋》以外 竟是国内出版

最早的第二本苏联短篇小说的中译本。然而，这是一本多么草率的译本，翻阅一遍，实在使我忍不住脸红。

这也难怪，当时的我还是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不要说在外国语文上的修养不够，就是本国语文的运用也很幼稚，只是凭了一股热情，大胆的尝试了这工作，用来填补了当时出版界的这一类空虚，同时也暂时满足了我自己以及当时同我自己一样的许多文艺青年对苏联文艺的饥渴。因为当时是不大有机会能读到苏联文艺作品的，就是我这本小小的短篇作品翻译集，出版后没有几年，也就被禁止了。

《新俄短篇小说集》是一本三十二开，一百八十六面的小册子，其中一共包括了五位作家的作品：迦撒询的《飞将军》 爱罗索夫的《领袖》 比涅克的《皮的短衫》 伊凡诺夫的《轨道上》 西孚宁娜的《犯法的人》。最后一篇占了一百页以上的篇幅，实际上是个中篇。在曹靖华的《烟袋》里 也收了西孚宁娜女士的这篇作品，题名为《犯人》。

除了译文之外，卷前还有一篇介绍文：《新俄的短篇小说》 共有四千多字。我看了一下末尾的文字：“一九二八 二月二十下午 灵凤于听车楼 ”不觉依稀记起了当年翻译这些小说的情形。听车楼是我们当时在上

海霞飞路（今日的淮海中路）所租赁的一家商店的二楼是《幻洲》半月刊的编辑部，因为面临电车路，从早到晚车声不绝，所以给它题了一个“听车楼”。这几篇小说的译文，其中有一两篇一定是先在《幻洲》和稍后的《戈壁》半月刊上发表过的。封面画和里面的衬纸图案，也都是我自己当年的“大作”。

不用说，这本小说集是根据英文译本重译的，前面的那篇介绍文，大约也参考了英文书上的材料，因为我实在不敢相信当时的我，对于苏联文艺，能有那些虽然幼稚，可是在今天看来还不过份谬误的解释，而且能洋洋洒洒的写出四千字之多。

一九二七年，正是苏联革命的第一个十周年纪念，在我的那篇介绍文里，曾写下了这样的话：

“自一九一七年至现在（指当时的一九二八年）有了苏维埃政府十载的经营，在各样的事业粗具规模之中，新俄罗斯的文学便也应运而生了。这些新时代的天才，经了革命的炉火悠久的锻炼，终于替代了旧的位置而产生了。……”

今天，已经到了我们来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日子了，苏联作家们在文艺建设上早已产生了许多无可比拟的更光辉的杰作，我仅以这一篇谈谈三十年前自己一本小书的短文，作为参加这个人类

最喜悦的节日的献礼。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

在香港

歌德的一幅画像

有一幅歌德的画像，据说是最为人喜爱的他的画像之一，画着他在意大利作考古旅行的情形，坐在露天旷野的一张石床上，身边有许多断碣残碑，远处山上还可以见到一些罗马古建筑。歌德头戴阔沿的毡帽，斜坐在石床上，悠然出神，好象沉缅在思古的幽情中，确是一幅画得好，也是一幅令人见了喜爱的画像。

三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的一家旧书店里，从一册德文杂志上见到了这幅画像，而且是用彩色印的。当时就十分喜欢，又因为那时的彩色印刷品是不多见的，买回来后就一直当作是自己心爱的一件艺术品，慎重的夹在画夹内，因此从上海只身来到南边时，成千上万的书册都舍弃了，这一幅歌德的画像却被夹在一叠画叶中带了出来。我最初从那册德文杂志上撕下这幅画像时，并不曾去留意这是谁的作品。后来多读了几册关于歌德的研究和传记，又在无意中买到了一部歌德画册，这才知道是歌德同时代的一位德国画家约翰·威

廉·第希宾的作品。

这幅画像作于一七八六年，是在歌德到意大利去作考古旅行时所画。当时第希宾已经旅居意大利，歌德到了意大利后，两人就结下了友情。第希宾正是那些无数的歌德崇拜者之一。由于歌德在罗马与他成了邻居，两人不仅经常相见，而且第希宾还成了歌德的向导，陪了他去参观罗马古迹。这一幅画像就是在这期间画的。

第希宾在这年（一七八六年）十二月九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上，叙述他有机会结识歌德的喜悦之外，曾提到了这幅画像，说他正在着手为这位伟大的人物作一幅画像，要画得等身那么大，画他坐在古罗马废墟之中，缅想人类行为的命运。

歌德在他自己写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了在这次意大利旅行中，第希宾给他的帮助之大。

这幅第希宾的歌德画像复制品，就这么一直被我珍藏着。虽然复制品的尺寸很小，不过三十二开书页那么大，而且时间久了，彩色也有些黯淡起来，但是仍一直受到我的珍爱。

一九四六年左右，郭老来到了香港，最初住在九龙尖沙嘴附近的乐都公寓，后来迁居到山林道的一层楼上，有一次林林同我谈起，说是郭老的新居墙上缺少装

饰品，希望我能找一点什么给他挂挂，我听了就灵机一动。想起自己珍藏多年的这幅歌德画像，若是能送给他，真是物得其所，当下就答应了林林，说是让我想一想，迟几天一定有所复命。

我回家后赶紧将这幅画像找了出来，虽然陈旧了一点，仍不失为一幅可爱的艺术品。郭老是歌德作品的中译者，他自己现在也对考古工作发生了兴趣，将这幅歌德作考古旅行的画像送给他，实在再适合也没有。于是我就拿到玻璃店里去配镜框。又因为这幅画太小，便将另一幅弥格朗基罗壁画的复制品：《上帝创造亚当》也拿去配镜框 准备一起送去。

我记得从前郭老住在上海民厚南里时，在楼下的墙上曾挂着一幅悲多汶的画像，还有一幅仿佛是诗人雪莱的画像，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两幅画，文章是早已读过了，后来有机会亲眼见了挂在墙上的这两幅，仿佛是谒圣者亲身到了圣地一般，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他再次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的一个弄堂内，楼下墙上有一幅许幸之临的拉斐尔圣母子像，大约还是在日本送给他，由日本带回来的。画幅很小，是圆形的，直径不过五六寸。因此我又将自己所画的那种比西亚斯莱风的装饰画，选了两幅配了

框子送给他，使他见了很高兴。

对于他家中墙上装饰品的关心，我可说是很有渊源的了。

两幅画的框子配好后，我便约了林林一起送去。恰巧那一天郭老不在家，等了一会仍不见他回来，我们便在墙上找了两个适当的地位给他将这两幅画挂好了才走。我想他回家发现墙上多了两幅画，一定会十分诧异。

可惜后来他离港北上，这两幅画的下落如何，尤其是那幅我珍藏多年的歌德画像的下落，已经不大容易知道。我但愿他能一直带在身边，甚至至今仍挂在他的书房里，那才使我高兴哩。

记得有一年，我偶然从一本外国杂志上见到一幅雨果的照像，是他被放逐到国外，坐在一块崖石顶上，遥望故国的情形。当时郭老避祸在日本，过的正是这种生活，我便剪下寄给他，他回信表示很高兴，而且很感慨，后来好象还写过一首诗。

最近，歌德的意大利旅行记有了新译本出版，附有许多插图，其中就有这一幅画像，使我想起了这些往事 遂缕述如上。